



對傳教及文化的神學反省

Fleming 著 余淑儀譯

一九七零年，哈佛大學的美籍中國史學權威費正清（J. K. Fairbank）在美國歷史學協會的聚會演說時指出，傳教士在中國「成了無影的人」。費正

清並非指大學課程中缺乏傳教學著作，但大多數是流於聖徒傳記形式或以發揚傳教精神為主，鮮有具批判性的研究。在當時甚或以後，有關中國傳教的批判性研究少之又少，其中又以基督教學者所作的佔了大部份，天主教則絕無僅有。以下，我希望透過對美國加州耶穌會在華傳教工作的批判性研究，令天主教在華傳教史多露一點輪廓。

加州耶穌會士僅在中國服務了廿九年（1928-1957），他們的工作剛起步便碰到同期在中國所爆

發的一連串無可避免的歷史巨變，決定了基督徒傳教工作的命運。加州會士所遭遇的一切，也同樣發生於其他基督徒傳教團體中。

也許祇有當年在中國的傳教士才體會到那些巨變的後果。中國的基督徒與神職人員繼續在這些巨變之下生活。我並非認為加州會士應為維護他們的傳教工作而改變作風，諸如與中國共產主義政權合作等；我亦不是說中國共產黨本來可以不打擊傳教事業，因為傳教士與共產黨的對立早已陷於僵局，共產黨運用暴力去解決問題差不多是必然的步驟。我要說的是，假若當時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能減低對中國敵視態度，代以較具彈性的協調立場，可

能會大大改變中國對基督徒傳教士的處理手法。

要探討加州會士在華傳教與文化的關係，有七點可作為核心：一·天主教在歷史及中國文化中的臨在；二·由於西方國家自視為「基督徒的文化」，傳教士帶來中國的福音訊息充滿西方文化色彩；三·傳教士未能適應「中國文化」；四·教會的官僚架構妨礙了傳教士適應中國文化；五·適應中國文化的失敗引致傳教士在傳教工作上的損失；六·西方色彩的傳教工作消失後為中國教會的發展引來新的動力；七·雖然加州耶穌會士在華傳教的人數不多，為時亦短，但其歷史意義卻遠超當時所預料的。

在撰寫加州耶穌會士的歷史之前，必須明白到，「歷史可以是絕對價值、權威及我們心目中的神話與理想的混成。歷史亦可以是將矛盾與妥協儘量拼湊至合乎邏輯。研究傳教就必須冒著揭發一些不愉快事實的險，亦可能招惹出毫無保留的批評。」加州耶穌會士在華歷史亦難免犯上這方面的險。那些會士面對的困難不少，安慰卻不多。他們的委身也

許無甚成果，他們的孤立絕非其他美國同道所能經歷。他們雖然懷著善意和受過優良的教育，卻天天受到抗拒。他們的生活方式遠較大部份的中國人舒適。在共產黨接管之前，他們一直獲得禮遇，因為他們既是外國人又是神職人員。加州會士多是平凡人，有些具備聖德卻才智平庸，兼具聖德而才智卓越者甚少。有些耶穌會士以傳教工作來取得自我認同，有些則完全不理會外在的情況。大體上，他們都是謹慎、善良而溫文的人。也許人們會因他們而明白到，傳教事業所靠的是傳教士的個人氣質，而非苦修訓練或鐸職教育。

我們亦必須討論上主在歷史中的臨在，及如何引領歷史邁向終極，回到祂的眷顧之內。要是缺乏對上主眷顧的信靠，傳教工作便毫無意義可言。我舉莎士比亞劇集中《哈夢雷特》為例，劇中主角會說：「歷史是上主眷顧的路向。」在劇中第五幕第二場，哈夢雷特對他朋友說：「在我的內心有一種令我不能入睡的交戰……無論我們如何苦心經營，

但冥冥中早有主宰決定我們的終向。」

哈夢雷特的說法，來華的加州傳教士「*Thornton* 肯定亦有同感。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在揚州被日本人拘留，隨後又被共產黨人在揚州及上海監禁了十個月（由一九五一年六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）有一回，他告訴我監獄的情況實在差透，身體飽受折磨，盤問永無止境；然而，他所以能掙扎生存下去，全賴上主的確切臨在及對整個傳教事業的眷愛。爲了這個傳教事業，他與其他數以千計的傳教士獻出了自己的生命。*Thornton* 有點像哈夢雷特，睿智明理，能洞察人性中不爲人知的一面。他十分了解哈夢雷特的掙扎與堅忍。如今中國教會已重振活力，在不斷掙扎中成長。中國基督徒在迫害中保持了信德。如今這個僅僅粗略成型的教會竟能倖存，顯然上主的眷顧繼續運行於歷史中。

假如上主眷顧了加州會士在中國的工作，那麼祂的臨在肯定並非即時可見。會士心中一直盤算著統計數字，特別是皈依者的數目，視之爲經驗到天

主臨在的準則。甚少人能理解這段時期甚或其後紛亂年代的真正意義。中國國民黨、共產黨、基督徒傳教士、商家和政治家等等不同的組織，都嘗試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撰寫中國歷史。中國共產黨做得很成功，但他們的歷史觀點竟驚人地與傳教士相似。一如同時代的傳教士，那些加州傳教士按善惡力量的對立來看中國人的生活及歷史，將中國拒絕接受基督教義（中國的基督徒從未多於人口的百分之二）與貧窮、戰爭、無知、天災、意識型態衝突、種族自我主義、政治陰謀、人口過多、紛亂、失業和官僚制度，都算成惡事。因而使來華的加州會士都帶著一份戰鬥心情，自視爲投身於大規模的「靈魂的交戰」中。按《默示錄》的說法，在「中國異教徒」的靈魂內存在著天主與邪惡的爭鬥。那些加州傳教士蒙選前赴中國，去推翻教會認爲屬於異端的中國神祇。身爲傳教士，這些加州人奉派去以基督徒的神取代中國的神祇，並確立中國的教會。可是，當傳教士嘗試去推翻那些本地神祇時，所作的卻成了

企圖推翻中國人的文化及社會的宗教性法統，也成了一種外來的干預，因而遭到中國人極力抗拒。傳教士從未承認他們有文化上及政治上的企圖。他們視自己的傳教工作為「靈性」的使命；但許多中國人卻對這種基督徒的使命另有看法，特別是那些傳教士獲得外國政府的幫助、拒絕學習中文及以異於中國人的方式來生活時更甚。那些傳教士從來不會對自己的世界觀的根本缺陷，即對哲學上和神學上有關肉身與靈魂的對立觀念，有所質疑。

加州會士甚少在傳教使命上反省有關文化與政治的問題，他們天真地認定自己的目標一貫正確。凡屬於天主教和西方的都是好東西，反之就是值得懷疑或屬於邪惡。雖然教宗本篤十五世、庇護十一世、庇護十二世都致力建立一個有中國面貌及精神的中國教會，同時糾正過往在中國的政治上和教會體制上的錯失，他們的改革卻來得太慢和太晚了。加州會士拒絕承認基督信仰早已在中國存在，一如他們的法國同道拒絕承認利瑪竇的傳教神學與作風。

加州會士並未按羅明堅(M. Ruggieri, SJ)的忠告，為贏取中國人信奉基督而成為中國人。他們沒有學習中文，無法成為中國文化的學者，結果是無知、妄自尊大、疏離和工作方向失誤。他們專為在華的美國機構僱員服務，乘坐美國砲艇航行，熱衷於參與上海的美國教友家庭聚會，喜歡收聽英語節目「上海教友時光」及閱讀英語月刊《教友期刊》，這一切都是浮面的傳教活動。文化交流少之又少，中國人須諳英語才可以參與他們的活動。拒絕本地化嚴重地挫損了加州會士在中國的傳教工作。

加州會士在華期間，一直對中國人抱著家長對子女的態度。這種態度後來有所改變。他們表面上十分敬業樂群，在《中國通信》與《耶穌會傳教工作》等刊物中充滿笑容。照片中的會士被嬰孩、微笑的男童和青年人所圍繞。他們絕少與成人合照，與女性拍照更絕無僅有。圖片中他們通常以施惠者和負責人的身份出現，中國人卻經常是受惠者。無疑，中國人真的需要他人協助，但問題在於他們常

被描繪成迷途待救的無家可歸者。中國人都被描寫成好奇、古怪、難以理解及難以接觸的。文化範疇的分歧被視為需要在行為上加以糾正。圖片中所顯示的中國偉大之處，竟是指由傳教士所建立的廣廈。

對於中國的文化、風俗、歷史，祇作出一些口惠而不實的服務之餘，他們照搬西方的想法來建設中國教會，不是法國式就是美國式。直至共產黨接管中國之時，傳教士才改變他們對中國基督徒的態度。當中國人因著信德及爲了信仰而受苦時，那些加州會士才開始把他們看成年人。當那些加州會士與中國人一起受苦越久，或親眼看見中國人比他們受苦更深時，他們愈能認同中國人。一同受苦，令他們把過往對中國人難以接觸的感覺一掃而空。

時代的紛亂並沒有損及加州會士對中國的貢獻。

G. Dunne 闡釋利瑪竇的傳教學如何適用於當代中國，
F. Rouleau 在學術上作出的貢獻，已由三藩市大學中西文化史研究所開始向其他領域拓展。P. Bourret 雖在中國只有一段短時期，但亦在科學和大眾傳播

學上作出貢獻。L. Down 留下他與青年人合作的心得。C. Simons 肯定了農民的神聖及爲他們服務的意義，這特別見於他舉辦的成人領袖課程，而農民的數目佔中國人口的八成。

此外，J. Finnegan 和 T. Philips 肯定了適應中國文化的需要。E. Murphy 和 R. Dailey 與中國學生和神職人員留下深厚的友誼。E. Faly 培育出富創意的領袖人才，他早已相信外籍人士在中國教會將成爲次要的角色。不少會士更爲歸皈者受苦，因而得到中國人的認同。G. Wong 仍留在中國，繼續爲受苦作出見證，這種奉獻如今已轉化爲希望。因著這些貢獻，他們沒有理由相信那些曾特選「爲」中國服務的加州耶穌會士，在當前中國致力現代化之際，不能「被」中國召選前去服務。這些選擇有待交談來促成。但加州耶穌會士昔日的經驗，必將發揮作用。當一切複雜的疑難淡化之後，往日的一切輕率不慎，都可以爲中國將來建樹更好的傳教工作提供借鑑。